

教育地平线丛书

丁钢 主编



历史的背影

一代女知识分子的教育记忆

**BEYOND THE EDUCATIONAL MEMORY
OF THE POST-MAY FOURTH
FEMALE INTELLECTUA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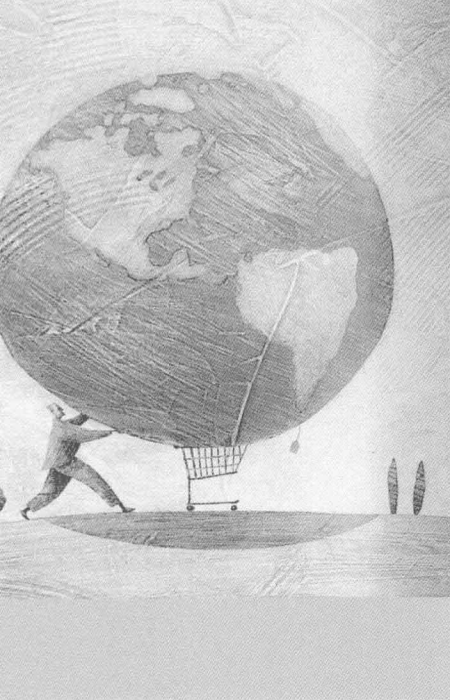
姜丽静/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教育地平线丛书

丁钢 主编



历史的背影

一代女知识分子的教育记忆

BEYOND THE EDUCATIONAL MEMORY
OF THE POST-MAY FOURTH
FEMALE INTELLECTUALS

姜丽静/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北京·

出版人 所广一
责任编辑 周益群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的背影：一代女知识分子的教育记忆 / 姜丽静
著.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 5
(教育地平线丛书 / 丁钢主编)
ISBN 978 - 7 - 5041 - 6047 - 8

I. ①历… II. ①姜… III. ①女性—知识分子—高等
教育—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D693. 71②G649.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3411 号

教育地平线丛书

历史的背影：一代女知识分子的教育记忆

LISHI DE BEIYING: YIDAI NÜ ZHISHI FENZI DE JIAOYU JIYI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9号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邮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9421
传真	010 - 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奥都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9 毫米×239 毫米 16 开

印 张 26.75

字 数 388 千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本研究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10YJC880055）资助

总 序

20 世纪以来，教育理论的发展常常是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而实现的，各类教育学科分支的产生，既是教育研究视野扩展的标志，又是跨学科研究方法在教育中运用带来的结果。多学科或边缘学科研究已成为理论创新的新增长点。事实上，如果说有综合学科的话，应该说没有什么学科比教育学更为综合，因为教育学是研究与实践如何培养人的学科，有什么能够比这种任务更为复杂而更需要运用多学科去加以研究？而展开教育文化与社会研究，也将昭示教育学科本身的理论和实践使命。

可以说，教育问题，首先是社会和文化的问题，理解

教育活动，离不开对其镶嵌的社会与文化情境的理解。我们主张把文化看做是意指一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由此认为教育作为文化传递与创造的核心，其理性的价值取向，只能是某一文化结构活动的历史地形成的产物，并且决定于这一文化结构本身的活动方向。脱离实际的文化经验与处境，只能使文化教育变成一种抽象的泛（非）文化的活动。所以，强调探究一种文化解释的教育理性，文化经验或处境的描述仍然是必要的。对于教育应当是什么的价值判断，就必须对某一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广泛的比较与综合，以减少文化偏见。更重要的是，适合于自身需要的教育理性及其体系，并不是完全依据社会发展水平或阶段来加以判断的。来自于不同文化处境下而发展的教育理性，本身也是具有适切性的创造。否则，人类许许多多多意义的文化经验都将受到局限或排除。

在教育与文化关系的探究方面，学科建设并不是研究的起始目标，就像学术界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热后的反思一样，没有细致的、实证性的和个案的深入研究，任何学说的建构只能流于空泛。因此我们在教育文化方面的关注，一是努力把握教育作为文化继承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即教育对民族思想、道德、风俗、艺术乃至每一世代的认知图式等方面的文化传递功能；二是注意教育的文化诠释，即从文化处境的角度对教育现象进行文化的多样性解析；三是重视文化与教育变迁的双向作用力，即从文化对教育变迁的作用与影响来探讨教育发展的方向与内容的变化。

至于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我们认为社会结构和人们的自我概念相关。每个社会的知识层面是能够用人们的社会特性来解释的。换言之，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本质和特性，虽然群体往往对个体的发展具有制约作用，但是个体的发展是某种平衡活动。一方面，它必须创建对自主的信念，人有自己的意志，有选择的自由，一定程度的可能性，但是它还必须将个体的自我联系到他人的世界中去，包括朋友和家庭、学校、群体。对他人的承诺义务联系着个人与他人，它会潜在地限制个体的自主性。每个个体实际上似乎不可能离开自主和义务这两者而生活，个体的生活就是努力实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由此，个体的发展一直是一项公共事务、一种道德关注，更是一种教育的话题。这即是说，个体的本质和塑造实际上既是个人的，也同样是社会的。换言之，个体既要满足自身的需要，也同样包含对他人的承诺和义务。所以，个体发展作为一个公共话题，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事务，而且有益于那些负责保持一种适当的道德秩序的机构——学校、家庭以及国家。

既然个体发展是私人活动，同样也是公共行为，我们就可以清楚，在教育学强调为个体的发展和为社会的发展的本质时，我们必须把不同差异的个体发展看作教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并通过对不同差异个体的培养和发展，来促进社会的发展。

显然，研究教育文化与社会这样貌似宏大问题的时候，我们依然不能忘记教育学本身所具有的实践性特征，而必须从其内含的实践本质出发开展理论的研究。简而言之，教育研究是建立在每个个体发展的基础上，以及存在于对于其镶嵌的社会与文化情境的理解之中。

如此，教育研究想要履行教育学科本身的理论和实践使命，就必然跨越学科之间的疆界。而本系列出版选题则多从跨学科视野研究教育中的政策及相关各类教育问题，无论是运用多学科方法进行田野研究、案例分析和叙事探究等，都力图融入国内外前沿的理论与方法，吸纳国内外的前沿研究成果，来推进教育尤其是中国教育的发展和理解。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从跨学科视野以及多学科方法研究教育问题，并不是作为对于教育学自身专门学术领地和话语体系探寻的回避和遁词，而是真实地期望在研究中形成适合教育自身理论领域界限、概念范畴体系、知识范型和方法论的理论探究，通过开拓新的研究视域，切实地推进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创新。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本丛书以国际学者最新前沿研究成果的译著和国内学者本土原创研究成果相结合方式出版，也意味着一种尝试，即诚望作者和读者一起能够在这种交互阅读中获得一种别样的学术对话和交流的经验，并在一个共同的学术对话和交流的平台上，加入我们对于教育理解的行动过程。

21 世纪的教育地平线，既远亦近，我们热切地期望所有关爱教育的人们共同努力，一个更为平等、民主、和谐的教育世界必将出现在世纪教育的地平线上。

丁 钢

2006 年 7 月

目 录

导 论 / 1

第一章 松动的边界：1917 年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 / 37

一、红楼内外 / 38

二、改组缘起 / 44

三、早期的校园：目的、课程、教师与规则 / 50

第二章 多样的传统：女性个体的早期教育生活 / 67

一、寻求“新女性”：程俊英的故事 / 68

二、才女传统的承续：冯淑兰的早期经历 / 80

三、与传统的疏离：庐隐的幼时生活 / 95

第三章 学术冲突中的教育图景：“五四”时期的 女高师 / 113

一、“国故派”的学界际遇与国文科的教育转向 / 113

二、新兴知识分子的崛起与学术教育体制的确立 / 149

第四章 新身份的探寻与认同：女性个体的蜕变与新生 / 183

一、《诗经》情结与学者身份 / 183

二、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 / 200

三、新文学创作第一人 / 214

第五章 学人与学术：女性个体的“士”途远征 / 229

一、创作与教学：庐隐的困厄与坚守 / 230

二、为学与为师：冯沅君的深造与自得 / 255

三、治学与传学：程俊英的遭际与坚持 / 304

结 语 / 345

附录1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沿革概略 / 351

附录2 庐隐、冯沅君、程俊英主要著述目录 / 353

附录2：1 庐隐主要著述目录 / 353

附录2：2 冯沅君主要著述目录 / 366

附录2：3 程俊英主要著述目录 / 380

参考文献 / 391

后 记 / 415

导 论

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产生 及其发展脉络

知识分子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人们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已经到了“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纷乱状态。从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对知识分子最为宽泛的界定——包括那些从事知识的生产、解释、教授、传播乃至大量“消费”这些知识或管理这些知识的人，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知识分子仅仅限定于那些因为其赫然成就而被誉为“文化瑰宝”的人，他们是社会群体的精神领袖，甚或如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所指出的，大学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识分

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则倾向于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每一时代的批判性良知”。（黄平，1993）

事实上，如果抛开这些纷繁歧异的界定和各位思想家站在自身立场上的理想界说，多数人仍然倾向于认为，知识分子首先意味着“有专业知识的人”；此外，他还秉承一种超越个人私利的社会担当精神。（陈来，2003）我们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除去这一“大众化”的基本特征之外，还将主要限定在接受高等教育，并从事知识的生产和散布的人，主要包括作家、学者和教师等。

知识分子及其所秉有的社会担当精神一直被假设成最先出现在19世纪的沙皇俄国，然后通过西欧北美的无数辉煌化身传遍世界。但是，杜维明和余英时等人的研究却揭示中国传统士人所早已具有的近似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尽管他们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尽相同，中国现代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出现是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后向现代转型的产物，但是也与原有的士人传统有着思想上的蝉联关系。（杜维明，2000；余英时，2003）

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直接促成传统中国“四民社会”的离散和解体，伴随这一千余年来读书人仕进之路的横腰切断，位居“四民”之首和社会权力中心的传统士人开始向现代意义上“自由浮动”的知识分子转变。（罗志田，2005）知识分子与传统士人相比，存在很大差异。在前近代时期，传统士人往往通过科举之路直接进入国家的权力中心，官场或者说政界是他们理想的生存空间。入仕后，他们将凭借通过长期的“学”所把握的“道”来改造社会，实现“治平天下”。因此，在他们这里，就形成了“道·学·政”的完美链接。（杜维明，2000）¹⁻²⁹与之相应，在知识结构上，传统士人推崇的是“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通人之学；在治学方法上，讲求的是“切己体察”、“深造自得”的内省式体悟方法。与之相比，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则有着明显不同的功能定位、知识结构和治学风格。知识分子主要通过学校教育获得某一学科领域的专门知识，高等教育机构、科研院所和文化传媒等学界或者说知识界是他们主要的寄居中心，他们并不直接参与社会改

造，而是通过知识的生产和散布来启蒙民众，间接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在知识结构上，知识分子首先是现代学术分科的产物，现代学术体系讲求分工合作、分途发展，知识分子大多专治一科，各司其职。在治学方法上，则多数遵循科学研究的方法，彰显出注重经验、实验的实证主义风格。（许纪霖，2005a）（陈平原，1998）^{导言}

事实上，在由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中，有两个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转承作用。其一，1905 年科举制的废除，直接切断了传统读书人的仕进之路，使政治和学术开始分途发展，并迫使原来位居四民之首和社会权力中心的“士”向现代意义上“自由浮动”的知识分子转变。其二，新式教育的推广及其对西方现代学术体系的植入，促使中国传统学术向西方现代学术的嬗替和转型，并最终促成现代学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从而为知识分子的产生提供切实的实施机构、生存场所和制度保障。由此可见，停废科举只是消解了传统士人所赖以存在的外在制度基础，而推广新学、现代学术教育体制的建立，方才是造就知识分子其内在知识结构和治学理路的关键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两个过程中，高等教育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启承作用。它不仅是“知识分子”退出社会权力中心之后“自由浮动”的寄居中心，也在推广新学，建立现代学术教育体制的过程中起着率先垂范的导引作用，从而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主要诞生地。（陈平原，1998）^{导言}（左玉河，2008）

需要说明的是，科举废除后，“士”作为一种社会身份虽然在现代社会结构中已经消失，但是“士以天下为己任”的弘道精神却仍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余英时，2003）^序这既是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中的“流风余韵”，也是 20 世纪上半期内忧外患的社会情势所逼使。

但是，20 世纪上半期的知识分子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仍然存在明

显的代际差别，体现出由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换的蜕变历程。^① 总的来说，1949 年之前以“五四”事件为中心曾产生过三代知识分子。第一代以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人为代表，他们大多出生于 1865—1880 年间，早年受过系统的国学训练，在知识结构上都是出入经史、博通古今的“通人”风格。此外，他们不但有传统功名，也多以士人的姿态，早年大都致力于政治与学术的统一，或者推动变法，或者提倡革命，只是当改革或革命的努力失败后，才不得不弃政从学。而属于章太炎弟子辈的黄侃和刘师培也可以归属于这一代知识分子。

第二代知识分子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以蔡元培^②、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梁漱溟、周作人等人为代表。这代知识分子多数曾经留学海外，接受西方现代学术的直接训练，因此他们在知识结构上，虽然仍有博通的意味和取向，但是多已能分门别类，各就性之所近，专治某科。此外，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他们已不再走学优则仕的道路，而是寄居大学等科研院所，专事知识的生产和散布。但是，在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也往往存在“科举”时代的“遗迹”，表现出他们多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内心时常处在“著书”与“保国”的激烈交战当中。甚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更是重拾“传统士人”“治平天下”的“老路”，最终以发动革命、颠覆现存体制的方式来实现他们所握持的“理想社会”。因此“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虽然是开创中国现代学术范型的一代，并已退居社会的权力边缘，但是在心态上仍旧遗传了“著述复议政”，“在乡美俗”，甚或进军权力

① 这里对知识分子的代际划分及其特征描述主要参考许纪霖、王岳川和陈平原的观点。其中，在代际划分上主要借鉴许和王的观点，但两人并未深入论及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学政分途问题，在这一点上主要汲取陈平原的观点。参见：许纪霖，2004，二十世纪中国的六代知识分子 [M] //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79-88。王岳川，2000，现代知识分子的分代 [M] // 王岳川，目击道存——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散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5-215。陈平原，1998，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导言，第三章，第四章。

② 关于蔡元培的代际归属问题存在不同看法。许纪霖将其归入晚清一代知识分子，王岳川则认为，按年龄蔡元培虽然属于前一代，但就其在“五四”时期的作用来看，应该归入第二代。这里从王岳川的说法。

中心的士人情怀。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可以称为“后五四”知识分子。这代人又可以分为两批，前一批出生于 1895—1910 年间，以哲学家冯友兰、贺麟，历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文学家朱自清、闻一多、巴金、冰心等人为代表。他们在求学期间直接经历“五四”运动的洗礼，是“五四”中的“学生辈”，这代人早年既在家塾接受较好的古文训练，打下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多在新式学堂接受系统的新学陶冶，甚至多数人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具有很好的专业基础。与“五四”一代的“师长辈”不同，他们这代知识分子不但已经完成从通人向专治一科、分工明确的“专门家”的蜕变，而且多数隐居学院，专事知识的生产和散布。可以说，1917 年曾被蝉联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蔡元培所标举的“以研究学术为天职”的口号最终在这代知识分子身上实现。他们多数已不再怀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干政、议政、重回权力中心的“野心”，也大多不为西方语境中知识分子的专业性与公共性的内在分裂所搅扰。但是，他们之退守学院，躬耕于知识园地，既非对传统士人化民成俗、移易世风这一性格的漠然不顾，也并非对现代知识分子所秉有的“社会承当”精神的舍弃和规避，他们往往将自身对社会的关切寄寓于研究或创作之中，在刻苦治学和殷勤传学的背后所流动的始终是对学术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深沉关切。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大学者一般都不会将视野封闭在讲台或书斋，也不可能没有独立的政治见解，差别即在于发为文章抑或压在纸背。（陈平原，1998）^{导言}

韦伯曾经缕述西方知识分子的嬗变历史，与苏格拉底时代多数智者的知识生活更多响应于一种外在社会或神灵的召唤而产生的“天职感”（calling）不同，现代知识分子之选择以知识生产为业主要来源于一种“非此不可的内在志趣”，即“志业感”（vocation）的驱策。从天职感到志业感，是从神魅的时代到去魅的时代在知识分子心灵中引起的巨大变化。（韦伯，2005）¹⁷⁻³⁶若以此考量这一代“后五四”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无疑是一种“天职”与“志业”交相混杂的独特性格。

二、女性知识分子的兴起与研究问题的确立

言归正传，之所以交代上述背景，主要是为了引出我们的主题。

从高等教育作为新生知识分子的栖居中心和诞生地的意义来看，随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所国人自办和国立女子高等学府——的创立，也就催生了中国本土培养的第一代女性知识分子。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简称“女高师”）从1917年筹备改组到1924年升格为大学、改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七年时间，适逢“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也培养出一批显赫的女性。其中，既有在文学史界“堪称豪杰”的冯沅君、《诗经》研究名家程俊英和屈赋研究专家苏雪林等知名学者；也有曾在文坛与冰心齐名、“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中能够注目于革命性社会题材的第一人（茅盾语）庐隐，真实表现“五四”青年“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鲁迅语）的“淦女士”^①，20世纪20年代即以小说《棘心》、散文集《绿天》饮誉文苑的“苏绿漪”^②，以及“一星”^③、“隽因”^④、石评梅、陆晶清、谢冰莹和吕云章等一批曾推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并以其文学作品为女性解放、个体解放呐喊声援的第一代现代女作家；还有中国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缪伯英，曾投身政界、热心教育事业和社

① “淦女士”即冯沅君。20世纪20年代，冯沅君（时名冯淑兰）的代表作和成名作《卷施》出版，奠定其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由于该小说集署名“淦女士”，因此当谈及冯沅君的文学成就时，人们一般又称其为“淦女士”。

② “苏绿漪”即苏雪林。20世纪20年代，苏雪林曾以“绿漪”为笔名发表散文集《绿天》和小说《棘心》，在文坛轰动一时，因此她又被称为“苏绿漪”、“绿漪女士”。

③ “一星”即王世瑛。1917—1922年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部），与冯沅君、苏雪林、程俊英和庐隐等是同班同学。“五四运动”时期，曾以“一息”、“一星”为笔名在其时重要的新文学杂志《小说月报》等发表多篇文学作品，是较早加入文学研究会的女性成员，对早期女性新文学的发生多有贡献。

④ “隽因”即程俊英。1917—1922年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部）期间，曾以“隽因”、“菌婴”等为笔名，积极投入新文学创作，先后在《女高师文艺会刊》、《益世报·女子周刊》等报刊杂志发表多篇文学作品，并长期担任其时作为女性解放三大喉舌刊物的《益世报·女子周刊》的主编，对早期女性新文学的发生多有贡献。